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

吴雷川的 基督教处境化 思想研究

李 韦◎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

吴雷川的 基督教处境化 思想研究

李 韦◎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李韦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54-273-0

I. ①吴… II. ①李… III. ①吴雷川-基督教-思想评论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8835号

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

李 韦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越宏 袁 珂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80千字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273-0

定 价: 22.00元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编委会

杨圣敏 马 戎 郝时远 朱苏力 卓新平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
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成有 牟钟鉴 何其敏 杨桂萍 宝贵贞 赵士林
官玉宽 贺金瑞 班班多杰 游 斌 谢爱华 谢路军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
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牟钟鉴

副主任：何其敏

委 员：班班多杰 刘成有 杨桂萍 游 斌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总序

中央民族大学进入“985 二期工程”以来,“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实施了十大项目课题。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民族学与宗教学相交叉的新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理论框架探索方面,初步构建起学科的学理体系,包括确立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阐释它的主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说明它的主要议题及思路。在历史经验总结方面,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宗教工作的历程与经验,和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宁夏经验、云南经验、甘肃经验。在田野调查开展方面,选取了青海藏区、广西壮族、新疆七民族、西北回族等作为主要对象,围绕民族与宗教、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提炼出一系列新议题新见解。中心还实施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根据工程的要求,中心在实施上述课题时,把几届在读博士生组织到课题组中去,在教师指导下参与课题的调查与研究,使课题实施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于是形成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不仅丰富了中

心的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在民族宗教学教学科研上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为了向社会展示这些博士论文多姿多彩的内容,使之早日进入社会学术信息交流渠道,发挥它们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学术文化繁荣的作用,中心决定设立“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成立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按照一定的申报、送审、评定程序,把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并经过修订、达到出版水平的优秀博士论文纳入文库,中心从“985 二期工程”经费中拨款给予资助,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入文库的部分博士论文写作于“985 二期工程”实施之前,而在内容上符合民族宗教学的研究方向,所以也被采用了。今后我们希望这一文库能继续做下去,扩大它的容量,凡属于民族宗教学方向的优秀博士论文,不论何校何地,均有机会进入文库,使文库成为这一领域青年博士论文精品汇聚的一个平台。

民族宗教学研究,其主轴是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其主旨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我们要通过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扬民族宗教和谐的传统,找出民族宗教不和谐的原因,加以消除,从而达到和谐。我们认为,要实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民族与宗教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确立和实践多元和谐、平等对话、共生共荣的现代文明原则,以便经过民族宗教之间的和解,达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民族宗教学的基本认知和宗旨所在。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青年学者决定着学术的未来。我们从博士文库里看到了民族宗教学的光明前景。让我们热情地帮

助他们,支持他们,使民族宗教学的研究事业后继有人,长盛不衰,以造福于社会和子孙后代。

中央民族大学“985 二期工程”

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

2009 年 3 月

引 论

第一节 吴雷川的生平及著作^①

吴雷川(1870—1944),本名吴震春。雷川本来是他的字,但后来以字行于世,其本名却反而很少用。祖籍浙江杭州钱塘县,但因其祖父在江苏徐州任职,故他的家人当时都住在徐州,他也是在徐州出生的。后来他的父亲任南河候补同知,在清江浦任事,^②但吴雷川的母亲带着他和其他兄弟姐妹仍旧在徐州侍候他的祖父。^③

吴雷川七岁开始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四书五经,十三四岁之后在其姑丈家附馆求学。光绪十二年,即吴雷川十七岁时,回杭州

① 关于吴雷川的生平主要参考查时杰:《吴雷川——致力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沟通的著名学者》,载《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香港: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70至74页和赵紫宸《当代中国信徒之介绍——吴雷川先生小传》,载《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八期1937年1月。

② 赵紫宸:《当代中国信徒之介绍——吴雷川先生小传》载《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八期,1937年1月。

③ 关于吴雷川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查时杰认为是在清江浦度过的,“后来其父在徐州附近的清江浦衙内,谋得一个小官职,举家移来清江浦居住,因此吴雷川的童年与青年时期是在清江浦度过的”。但笔者认为以赵紫宸和吴雷川的关系之密切,他必曾向赵紫宸讲述过自己的经历,故笔者以赵紫宸的叙述为准。

顺利考得秀才。1888年至1889年,他在北京伯父家准备乡试,但是却两次落第,1891年在杭州参加乡试又未中,1893年他又随哥哥赴顺天参加乡试,中了举人。1898年,吴雷川在北京参加京试和殿试,顺利考得贡士和进士,是光绪朝戊戌科第二甲中的第三十一名进士,不久又被点为翰林。但是吴雷川的仕途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受1898年的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他在此期间并未谋得任何官职,只好又回清江浦。1905年至1909年间,他担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并兼议绅之职。1910年吴雷川出任杭州一中学校长及咨议局议员。武昌革命之后,他曾出任杭州市市长。1912年吴雷川被推举为浙江省教育司佥事,六月即被调至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后为参事。

1914年,吴雷川在两位朋友徐巽风和翁廉铜的介绍下开始接触基督教,^①并最终在1915年冬季耶稣诞日,受了中华圣公会的洗礼。

吴雷川于1922年开始在燕京大学兼任任教。1919年他加入了发起“基督教新思潮运动”的生命社,^②后于1923年组建了只对

① Chu Sin - Jan, *Wu Leichuan - A Confucian - Christian in Republican China*,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8.

② 生命社前身为1920年成立的证道团,其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回应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基督教的冲击,以证明基督教适应时代的要求和讨论基督教内部的发展问题,后来在1922年的非基运动爆发之后,在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下,为回应此种情况下的剧烈社会动荡和冲击,1924年9月,证道团召开委员会改组为生命社,宣布该社的性质是“中外信徒个人结合的团体”,“不分宗派、党会与国界”,其宗旨是“用基督的精神、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点,使对于世界有积极之贡献:(1)研究、开发基督教的真理与功能。(2)谋求中国教会的进化与社会的改造。(3)应付世界潮流,尤注重中国知识界之亟需。(4)促进国际的亲善。”

中国人开放的真理会,并主持《真理周刊》的出版长达三年之久。^①1926年,吴雷川任燕京大学国文教授,不久,燕京大学请他担任副校长,1929年至1933年夏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1934年辞去校长职务,之后便回到杭州休养两年,后来又回到燕京大学专心授课直到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闭。在燕大被日军占领期间,燕京大学的许多职员都被捕入狱,如赵紫宸等人,但吴雷川因为年迈免于入狱,期间他在北京北海公园松坡图书馆靠抄写和卖字为生。1944年10月26日吴雷川因中风逝世,享年75岁。^②

吴雷川一生如有些学者评价,“在教育工作上,有极杰出的表现,不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工作上表现良好,也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曾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办学成绩十分出色,其中又以燕京大学为最;此外又因他正好代表中国儒家与基督徒的结合体,因此他一生也致力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著书立说、不遗余力,开国人中有关是类研究风气之先河,他的一生可说充满着传奇色彩。”^③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地对当时中国的时局变化作出回应,倡导并力图践行自己的信仰。

吴雷川著作共有五部:《耶稣的社会理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基督徒的希望》(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9年);《宗教经验谈》(与徐宝谦合编,青年会,1939年);《墨翟与耶稣》(上海,青

① 转引自 John K. 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74 first printing, 1981 second printing, P. 229.

② Chu Sin-Jan, *Wu Leichuan - A Confucian - Christian in Republican China*,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7.

③ 查时杰:《吴雷川——致力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沟通的著名学者》载《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香港: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年协会书局,1940年)。其中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他还写了大量文章,主要发表在《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以及后来的《真理与生命》上。

第二节 吴雷川的思想历程

我们从吴雷川的简介中可以看出,他早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个教育背景即使在后来皈依基督教以后仍深深地影响着他。皈依基督教对于吴雷川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思想上的转折。对于他的皈依过程,赵紫宸是这样描述的:“民国三年先生与基督教开始发生关系。当时,他住在北平宣武门内东太平街,与圣公会的教堂很临近。他有两个朋友,也住在东太平街。他们是知识界中的优秀分子,却都虔奉基督教,因此激起了他研究基督教的意思。此心一起,他立刻购买了一本《新约全书》,竟于两三日内,将全书读了一遍。书中所载的神迹奇事虽不能引起他的信仰,但其中有许多教训,实在是感动了他。于是他与他那两位朋友反复讨论。到了礼拜之日,他竟毅然到礼拜堂去听道,感觉到仪式的肃静,牧师的诚敬,足以帮助他摒除世虑,专心修养。过了些时,他立志要加入教会,作耶稣的信徒。……先生虚心领受,一本至诚,从民国三年夏季起,至四年冬季,足足用了一年半工夫,于耶稣诞日,受了中华圣公会的洗礼。”^①这是对吴雷川加入教会过程的一个客观陈述,他在回忆起自己信教的经过时,这样说道:“我和基督教

^① 赵紫宸:《当代中国信徒之介绍——吴雷川先生小传》,载《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八期,1937年1月。

发生关系,是从民国三年春间开始的。当时我在北京教育部供职,住在宣武门内东太平街。我有两位朋友都是知识界的人,同我住在一条街里,我们就时常往来。有一次星期日上午,我到他们那里去闲坐,坐了不久,他们忽然站起来说:‘我们要到礼拜堂去,不能奉陪了。’当时我很诧异:像他们那样有知识的人何以也要信基督教?但不及细问,就辞别回家,立刻去买了一本《新约全书》来看,用两三天的工夫将新约看完了,记得当时的印象是:神迹奇事都不能使我相信,但其中有许多教训实使我佩服。接着又看第二遍,就想到基督教能够流传久远,必定有它的原因,必是有研究的价值,又去和那两位朋友谈了几次,他们都劝我不妨到礼拜堂去听讲,和教会中人多有往来,于是我每星期都到礼拜堂去,就感觉到礼拜仪式的庄严静穆,可使我摒除俗念,传道的人诚心为人服务,足以引起我对社会的同情,同时我又反复地看新约书,一方面对义理更多有领会,一方面对于神奇的部分很希望教会中人能为我详细解释,因此就有意加入教会,那年夏在中华圣公会记名预备,至四年冬间就领受洗礼。”^①之所以如此“繁琐”地完整引用吴雷川对于自己信教过程的陈述,就是因为笔者认为他自己的述说能够更完整、更真实地再现其当时信仰状况,另外笔者认为他的信教动机和初信时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后来的思想起着“钥匙”的作用,他初信教时对于基督教的理性、社会关怀的态度似乎在后来从未改变过,只是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至于他要加入教会的深层动因,吴雷川自己在《我个人的宗教经验》一文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己加入教会大致有三个原因,一个

①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初版,1940年4月再版,第8至9页。

原因是受自己母亲敦厚慈祥,富于忍耐性的品质的感化;第二是自己所经历的磨难和所受的教育;第三则是自己入政界以后,对自认为极为空虚的生活状态的极为不满与苦闷,有信仰基督教的朋友的引导则是皈信的机缘。^①

如果说从儒家思想到皈信基督教,算作吴雷川的第一次的思想转变,那么在皈信之后对基督教认识的转变应是他思想的第二个转折点。对于这一点,吴雷川在其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有详尽的阐述。吴雷川在初加入教会时,对基督教持纯粹的信仰态度,积极参与教会的各种公益事务,除了办公之外,余下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基督教的事业,寻常的交际应酬一概谢绝。后来由于非基运动的兴起,吴雷川必须看各种新书及新报中的学说对其进行回应,这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徘徊和思考,吴雷川最终得出自己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所有教会遗传的信条与解说都不可尽信,教会的规制与礼仪也不必重看,只有耶稣的人格足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他是以身作则,教训我们做人必须以改造社会为天职,更教训我们持身涉世要服从真理,这正是我们做人的规范。”^②吴雷川对于基督教的认识是在受当时社会思潮和作为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双重压迫下产生的,他后期对于基督教相关的各种问题的阐述都是以此认识为“纲”或者是此认识的延伸。吴雷川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诠释一反传统、保守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一些学者认为吴雷川是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影响,如蔡彦仁就说:“我们无法得知吴雷川是否直接接受了这一西

① 吴雷川:《我个人的宗教经验》,载《生命》第三卷第七、八期合刊,1923年。

②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0年再版,第10页。

方神学思潮的影响,其解经功夫也未表现出西方学者的扎实与细腻,但是他的以理性为标榜,力求‘历史上的耶稣’,强调天国的现世理想性格,似乎辉映着当代西方自由派神学家的理路。”^①19世纪从德国等欧洲知识界兴起的自由主义神学思潮主张重新以理性原则审视《圣经》,主张以“历史批判法”来研究基督教,从而回到真实的基督教。我们从上述吴雷川对基督教最终形成的认识上,看到正是吴雷川运用理性思考得出的缺乏超越维度的,“此世”的基督教,他眼中的耶稣更多地体现了“为人”的一面。笔者在考察吴雷川的思想之后,认为确实如蔡彦仁所说,其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深受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影响,具体论述见下文。

吴雷川一生都在不断思考,而因他所处的时代跌宕起伏,他的思想也就随之不断变化。20世纪30年代,吴雷川以基督教的名义提供了一个具体社会变革方案,即认为天国是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他还试图调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为“革命的改造环境,虽然似乎是注重唯物的,而基督教的改造环境虽然似乎是偏重唯心的,然我们如果想到:社会上有一切不良的现象,人类之所以不得享受幸福,无非由物质方面的环境不良所致,乃至一般人的品德堕落,也莫非社会上恶的制度所养成。……然则唯心与唯物,实在还是殊途同归,又何必有歧视呢?”^②最终他将自己的理想归于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倾向在他最后出版的著作《墨翟与耶稣》中仍未改变,“社会间最不平等的现象,无过于人类的贫富不均,所以废除私有财产,使凡物皆归为公有平均分配,是

① 蔡彦仁:《经典诠释与文化汇通:以吴雷川为例》,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一卷第二期 2004 年 12 月,第 324-325 页。

② 吴雷川:《基督教与革命》,载《真理与生命》第五卷第四期,1930 年 2 月。

无可否认的真理。”^①这一时期的吴雷川最为突出的思想便是“暴力革命论”了,“自私是人类不可免的根性,而集体社会尤甚。因此,社会间的冲突不能根本消灭,社会间一切恶的势力必须用强力来抗争,所以爱的社会乃是最终的境界,而在改进的过程中,武力或强迫的手段,总是不能废除。”^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吴雷川的思想历程概括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粹的儒家思想;第二阶段则是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这个阶段之间还有一次小的转变,即从纯粹的、突出的表现为接近于传统的基督教思想转为自由主义神学,但笔者认为,吴雷川早期表现出来的对基督教的虔诚多半出于初信者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义的了解,后期受外部社会压力和出于对自己基督徒身份的自觉认同,积极地、痛苦地探索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终得出接近自由主义神学的结论。这个过程才能真正历史地体现和透射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和处境化过程。第三阶段,吴雷川转向社会主义。当然这三个阶段,尤其是后面两个阶段都不是“独占式”的,而是一种混合形式,只是某一思想比较凸显。邵玉铭分析吴雷川的思想历程时,也认为其思想经过多次转变,“基督徒知识分子中,他是最富折中性的一位思想家。他曾得进士,在未信主前是一位十足的孔子学者。……30年代他又有出人意表的改变,他倾向用激进的物质主义来解释历史、宗教和革命。30年代末期,他的思想是三种主义的混合——孔学、基督教和唯

① 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0年,第161页。

② 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0年,第161页。

物主义。”^①

若分析这三个阶段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深刻影响吴雷川一生的主要思想背景,虽然在非基运动思潮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等各种思潮的推动下,吴雷川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过批判性的、历史的反思,但他从未完全地、彻底地否定过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不可能也没有能够逾越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去诠释的阶段,这一点可以从下文笔者对吴雷川所有的著作和文章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第二、三个阶段的思想不过是吴雷川将入世的、主张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应用于当时社会实践的必然的逻辑结果。本质上来讲,第二、三阶段的思想虽然从内涵上看差别很大,但对于吴雷川本人来说,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并不存在强大的思想张力,因为这只是他运用儒家思想对中国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所作的回应罢了。

^① 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载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2月,第284—285页。